

蒋波 著



钱钟书 语文思辩录

QIAN ZHONG SHU YU WEN SI BIAN LU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钱钟书语文思辩录

蒋 波 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钱钟书语文思辨录

蒋 波 著

责任编辑：罗 兼

责任校对：龚 俊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岳麓山)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望城县湘江印刷厂印刷

850×1168 32 开 10.25 印张 258 千字

1997年8月第1版 199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 册

ISBN7—81031—570—6/I·043

定价：15.00 元

序

吴启主

钱钟书是我国当代具有国际影响的著名学者作家，有“一代鸿儒”、“百代智者”、“文化昆仑”的美誉。研究钱钟书，已成为当代人文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们把这一研究称为“钱学”。

著名作家柯灵把钱钟书的基本精神高度概括为两点：一是渊博，二是睿智。二者互相渗透，互为羽翼，浑然一体，如影随形。这一概括是十分确当的。说他渊博，可以《管锥编》为例。全书涉及的语言文字有7种之多：古代汉语、英文、拉丁文、意大利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所引用的中西出版物约4千余种；涉及的学科有文学、语言学、文化学、史学、哲学、心理学等10多种。由于他学识渊博，才站得高，望得远，看得透，撇得开。说他睿智，可以从他对问题的超乎^常学者的独到阐释看出。他进得去，出得来，提得起，放得下，升堂入室，揽天下珍奇入我襟袍，神而化之，不蹈故常，绝旁前人。

钱钟书因其渊博和睿智，才值得研究；同时也因此

才难于研究。有人说，“《管锥编》一书字字都由钱子称出，仿佛诸葛亮布八阵图，暗扣儿甚多，读者稍不留心，便陷入文字的迷雾之渊。”这话是不假的。钱氏的《管锥编》、《谈艺录》等主要著作多用文言表述，也给今人阅读造成了一定的语言文字障碍。钱氏“以解颐资解诂”的“滑稽游戏”笔法和态度，也给研究者正确深刻理解带来了困难。有人善意地向研习《管锥编》的同行进言：“要读该书，不能太纯朴，太实心眼儿，厚道老实人不行，能入不能出也不行。我甚至想，只有尖酸刻薄的人才能读懂《管锥编》。”钱著难读，钱氏自己也是清楚的，他在写给周振甫的一封信中说道：“故拙著不易读者，非全由‘援引之繁、文词之古’，而半由弟之滑稽游戏贯穿潜伏耳。”

从目前情况看，对钱著的关注尚主要集中在文学界，而且主要集中在文学创作上，史学界、哲学界、心理学界等都很少有人问津，语言学界也只有少数修辞学者关注。蒋波君的《钱钟书语文学思辨录》从语文学的角度研究钱著，具有开创之功，对钱学是一个重要贡献。

蒋波君 1975 年从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以后，二十多年来一直从事语文教学，对传统的语文名篇及语文教学的一些理论问题比较熟悉。他接触钱著进而研究钱著是从 1985 年开始的。十多年来，尤其是近两三年来，他集中时间深入地研读了《管锥编》（1~5 册）、《谈艺录》、《宋诗选注》、《七缀集》、《旧文四篇》、《槐聚诗存》、《围城》、《写在人生边上》、《钱钟书书信》

(共4种)、《钱钟书论学文选》(舒展选编)等原著，广泛地搜集并阅读了有关研究钱著的论著。蒋君在作了这许多扎实的研究准备之后来撰写钱钟书对中国语文思辩的专著，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了。

书名《钱钟书语文学思辩录》包含了三层意思：一是重“语文”，一是重“思辩”，关于这两点，作者在绪论中已作说明；“录”字，表示本书是笔记的整理和扩大。关于书的结构，蒋波君认为钱著有关中国语文的解读是一个可以划分的系列，他把它分成“语言方略”、“修辞技术”、“阅读手眼”、“写作智慧”四个部分，他把自己认为新鲜有趣或是别具一格的问题放到相关的“类”中，构成一个传统味儿较浓的结构，以亲近读者的习惯，从而亲近钱钟书。作者对书名和结构的构想，是颇费了一番心力的。

读完蒋君的全部书稿，我感到有如下许多特点：

(一) 笔记体式的味道较重，约80个问题分为四大块组合，长短形式不拘，以表达清楚为止。

(二) 研究钱著可以从许多方面切入，作者选择了“语文”作为切入口，这个研究角度的确立，与钱著的方法论特色有一定的联系，与作者长期从事语文教学工作更有直接而密切的关系。

(三) 作者追求“思辩”的高度，因为钱钟书的思辩智慧令人激动，作者想竭力从这个高度来描述。

(四) 本书所用材料多选自传统语文教材。这一方面是因为钱著中直接或间接地大量地涉及到这些材料；

另一方面是因为作者想把钱氏的一些观点引入到许多陈旧的语文阐释中来，以增多一些深度和生动。

我相信，《钱钟书语文思辨录》出版，会受到语言学和语文学界同行的热烈欢迎。是为序。

1997年1月7日

目 · 录

绪 论	(1)
一 语言方略	(3)
同时合训	(3)
美刺褒贬	(7)
愈用愈狭	(11)
同训异义	(15)
殊文同义	(18)
此长彼消	(23)
虚字解读	(27)
用字如兵	(32)
工于锻炼	(37)
二 修辞技式	(66)
比喻辨正	(66)
相异相比	(68)
亦隐亦显	(71)
愈分愈合	(74)
近取诸身	(76)
雅俗互济	(79)
喻之两柄	(81)
喻之多边	(86)
数不可执	(41)
实色虚设	(44)
尔汝群物	(49)
敬谦尊讳	(52)
称代活用	(54)
不 A 不 B	(56)
回鸾舞凤	(57)
调序倒装	(62)
引喻取分	(90)
曲譬而喻	(95)
一意数喻	(97)
贴而不粘	(100)
寻常奇崛	(103)
比喻理趣	(106)
功同跳板	(111)
牵合比拟	(120)

感觉挪移	(124)	语偶句俪	(151)
夸张增饰	(130)	问以多方	(157)
重言避复	(136)	正反对照	(162)
双关多方	(140)	拾级增高	(164)
迂回代换	(144)	赋诗断章	(168)
互文相足	(148)		
三 阅读手眼			(172)
语言天地	(172)	同中辨异	(199)
循环阐释	(176)	贴掩试读	(201)
冷看热读	(181)	考其终始	(203)
疑义与析	(182)	树义勿墮	(208)
老吏断狱	(185)	情感杂糅	(211)
兼采为味	(188)	性格复综	(216)
辨读多方	(193)	化象为形	(227)
会心文外	(196)	史蕴诗心	(230)
四 写作智慧			(236)
体物触悟	(236)	模山范水	(273)
虽爱必捐	(240)	待人知赏	(278)
蟠蛇章法	(243)	以画喻景	(282)
重章叠节	(246)	心口自语	(289)
异地同时	(247)	眼里舌端	(292)
使事用典	(250)	相得益彰	(296)
有声有色	(256)	想象造境	(297)
捕风捉影	(258)	悬拟设想	(300)
阿堵传神	(262)	以梦写物	(304)
素绘白描	(271)	破体创新	(313)
后 记			(317)

绪 论

本书题名《钱钟书语文思辩录》。有两个意思，一是着眼“语文”，一是注重“思辩”。

钱钟书是一座“文化昆仑”（舒展语），上山取宝，各有各的手眼。因为“钱学”包容文辞、文章、文学、文艺、文化与文明，古今纵览，中西打通，博大精深，这就为不同学科提供了一种“各取所需”的可能。从“钱学”里读出中国语文的知识和智慧，是本书“以管窥天”的一个角度。这个角度的确立，也与钱著的方法论特色有一定的关系。我们阅读钱著，会欣然发现钱钟书常常采用从“语文”切入的方法。在解读中西文化典籍时，他往往从字词训诂开始，探求本义，辨析句样，扒疏章法，抉剔文心，然后考其终始，连类而及，作古今的俯瞰和中西的“打通”，由反及复，循环阐释，达到义解圆赅的辨证意境；这个角度的确立，还与笔者长期从事语文教育工作有关，我读“钱著”，虽不敢偏废，但意有偏重，所谓“取一勺饮”，这也是钱钟书“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谈艺录》第416页引王船山《诗绎》）的开放性学术精神所包容得了的。

经过钱钟书剖析的“中国语文”的精神，不是传统的堆积，而是思辩的灵动。中国语文是一座智慧的富矿，它的内核是“辩证”，而钱钟书，用他的睿智的目光，照亮了整座矿床。

笔者曾经感叹哲学家庞朴《一分为三》立论的新切，同时，又激赏庞朴论“钱著”与“中国辩证法”关系的深刻见解。他认

为：“要想领略中国辩证法的智慧，与其去读某些以此名篇的专门著作，不如来读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他同时认为这种智慧“既是示范性的，也是理论性的”（详见《钱钟书研究》第三辑第1页）。“钱著”并不到处张贴辩证法的“原则和范畴”，这种“原则和范畴”是溶化在具体的“现象”中的，这种现象，大量的和生动的是不同层次、不同形式的语文事实，恰如“盐在水中”，你可以从“钱著”关于这种语文事实既是“示范性的”、又是“理论性的”的阐释中获得义解圆足的快感。

同时，有一点还应该指出，多年来，我们面对习以为常的各种“语文现象”，面对大量关于语文现象及其规律的各种描述和解释，其中包括对传统语文名篇的解读，似乎都有一种某种程度上的满足，许多内容看上去已经再也挖掘不出什么新意了，而钱钟书的辩证圆解的力量，实在可以让我们的大脑变得更灵透和轻松一些，可以让我们方兴未艾的语文研究的工作更多一份生动。

我把“钱著”中的这种解读看成一个可以划分的系列，分别从语言方略、修辞技式、阅读手眼和写作智慧四个方面勾勒出一个大概，这是最基础、最基本的几个团块，四个方面的内容也有“例释”的特点和作用。关于“鉴赏”和“创作”的一些内容，分别渗透到这四个方面中去，不再另立专章。之所以作这样的排列，是因为照顾到这部分知识体系的组合习惯和读者的认知习惯，结构上旧一点，目的在让我们更容易亲近永远新鲜的钱钟书。

一 语言方略

同时合训

关于一字多义，钱钟书的下述观点十分突出。

一、“粗别为二”

一个字的众多不同的意义，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是否具有普遍性的结构？能否将这种结构模式作出分类？钱钟书的基本看法是：

一字多义，粗别为二。一曰并行分训，如《论语·子罕》：“空空如也”，“空”可训虚无，亦可训诚悫，两义不同而亦不倍。二曰背出或歧出分训，如“乱”兼训“治”、“废”兼训“置”，《墨子·经》上早曰：“已：成，亡”；古人所谓“反训”，两义相违而亦相仇。（《管锥编》第2页）

一个字的几个意思相互关联，意思不同但也不相反，如“空”字表“虚无”又表“诚悫”，这是“并行分训”；一个字的几个意思是正反相对的，互相矛盾的，如“乱”字兼训“治”意，“废”兼训“置”意，这是“背出或歧出分训”。

“并行分训”，是同形多义关系；“背出或歧出分训”，是同形反义关系。这是词义的两种基本关系和模式的概括。

陆文虎《〈管锥编〉与若干学科》（载《〈围城〉内外》）一

文将“背出或歧出分训”又再分成“歧出分训”和“背出分训”两种，与“并行分训”鼎足为三，道理不是很充分。

第一，“背出或歧出”，用“或”字表选择，表示“背出”与“歧出”虽有差别，毕竟还是一类。不必剥离开来另立门户，弄个“粗别为三”。

第二，“背出”，指相反的意义关系，“歧出”虽有表示完全不同的意义关系的意思，但，在钱著中，更多的还是指相反相对的意义关系，看例子：

①钱钟书分析《易》“彖曰：革，水火相息”中的“息”字，有“生变”与“侵克”两意，并引《汉书·艺文志》“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相反而皆相成也”句来剖析两字关系，再作结论：“仅知生息、止息两意之歧出分训，而未睹《易》此语之以生息、灭息两意之同时合训也”（《管锥编》第28页）。这里是以“歧出分训”来指称相反的意义关系的。

②《管锥编》（第173页）载：“襄公二十五年，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前‘志’为言之在外者，后‘志’为意之在内者。斯亦一字歧出分训之例”。前与后，内与外，同字而意相对，著者用“歧出分训”来指称。

所以，可以把“背出分训”和“歧出分训”归于一类，称“背出或歧出分训”。

二、拈一弃一

一个字可以有相关联而不相同的几个意义，也可以有相反或相对的大不相同的几个意义，但是，在使用时，一般是“拈一弃一”，这是阅读和写作时语境选择的基本需要。

钱钟书认为词语本身具有意义是一种“体”，在具体的语境中选择和使用某一个意义，这是“用”，这与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的区别暗合，索绪尔曾经把这种关系叫做“象棋规则”和“一盘象棋游戏”。《论语·微子》“隐居放言”，“可释为极

言尽词，亦可释为舍置不言，然二义在此句不能同时合训，必须拈一弃一”，“是‘放言’之‘放’体涵分训，用却未著合训矣”（《管锥编》第2页）。“体”有两义，而“用”只取一，不可把“体”中之两义搅混到一起去，更不能不加区别，张冠李戴，造成解读的失误。

“拈一弃一”，要求我们在语境中精细地区别同形多义和同形反义的每一个具体义项，精确地解读文本。如“望”字，是一个多义词，在不同语境中有不同意义。“征之吾国文字，远瞻曰‘望’，希冀、期盼、仰慕并曰‘望’，愿不遂、志未足而怨尤亦曰‘望’”（《管锥编》第878页）。在具体的语境中，就不能望文穿凿，以此“望”代彼“望”，而应该仔细推敲，“拈一弃一”。

三、同时合训

“同时合训”是一种语言的哲学观，也是文字具有思辩色彩的魅力所在。钱钟书是在对黑格尔的批判中提出“同时合训”观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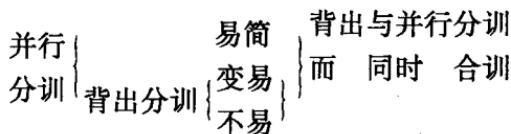
黑格尔鄙薄汉字“不宜思辩，自夸德语能‘冥契道妙’，并举‘奥伏赫变’一词能蕴‘灭绝’和‘保存’相反二义。钱钟书认为：汉字“不仅一字能涵多义，抑且数意可以同时并用”，“心理事理，错综交纠：如冰炭相憎，胶漆相爱者，如珠玉辉映，笙磬和谐者，如鸡兔共笼、牛骥同槽者，盖无不有。赅众理而约为一字，并行或歧出之分训得以同时合训焉，使不倍者交协、相反者互成”（《管锥编》第1~2页）。

“分训”，是一种“拈一弃一”的语境选择：“合训”，是几个意义辩证相联正反相合的交协互成。“分训”，在取舍中力求准确和恰当；“合训”，在解读时力求思辩综合和圆览周赅。

同时，从钱论中，我们可以分析出“合训”的基本模式：一是并行分训的字可以合训，一是背出或歧出分训的字可以合训。一是上面两种“分训”的字可以合训。中国古代思辩精神成熟之

早并不亚于西方，蕴含思辩色彩的概念常见著述，从钱钟书《管锥编》的大量论述中，谨拈数例以明其理：

①易之三名 《周易》中的“易”字，用“拈一弃一”法不能揭示它的深刻哲理。“易”字含三义：易简、变易、不易。用简图表示字义的“分合”关系：



(详见《管锥编》第1页、第6页的分析)。又钱钟书以“易”之“合训”思辩的眼光点读杜诗“出门流水住”的“住”字：“‘流’而‘住’，即‘易’而‘不易’也”(《管锥编》第五册第127页)。常“流”常新，是“易”，流而不断，是“不易”，非二义合训不能达诂。

②诗有三训 《诗经》的“诗”字，怎么理解？是否仅以诗体名论之。钱钟书用《毛诗正义》来说明“诗”字的思辩色彩：“然则诗有三训：承也，志也，持也”，“诗”的多义并列是一种“并行分训之同时合训”(《管锥编》第57页)的辩证“交协互成”。

③“风” 《管锥编》(第58页)云：“‘风’字可双关风谣风教两义，《正义》所谓病与药，盖背出分训之同时合训也”。

这是一种词义合训的思辩组合。

④反 “反者道之动”是表达“否定之否定”辩证思想的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的名言。钱钟书说：“《老子》用‘反’字，乃背出分训之同时合训，足与‘奥伏赫变’齐功比美，当使黑格尔自惭于吾汉语无知而失言者也。‘反’有两义。一者，正反之反，违反也；二者，往反(返)之反，回反(返)也(‘回’也有逆与还两义，常作还义)”，“‘反者道之动’之‘反’字兼‘反’义与‘返’亦即反之反意，一语中包赅反正之动为反与夫反之动

而合于正为返。窃谓吾国古籍中《老子》此五言约辩证之理”（《管锥编》第445~446页）。

当用“同时合训”的辩证观来看一字多义时，我们已经走到了义解圆赅的语言哲学的高度。

美 刺 褒 贬

这里的“美刺褒贬”是指词义的褒贬感情色彩，而不是指修辞或文艺的手法。

古今词义是不断变化的。语言学家一般把这种变化分成三种情况，如高名凯的《语言学概论》和王力的《汉语史稿》，均用词义的扩大、词义的缩小和词义的转移来描述这种变化；一般的教科书在这三种之外，又添加了“感情色彩变化”和“名称说法改变”两种（详见高级中学课本《语文》第二册第291页）。这里，我们拈出“感情色彩变化”这一类词义变化的情况，从《管锥编》对一些具体的语言事实“究其‘终始’”的分析中，来加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词义的美刺褒贬倾向决定了词义的感情色彩特征。一些词，可能一开始就不仅是“美词”，而且具贬义，只是用到现代，失去了“美誉褒赞”的一面，光剩了讥刺贬斥的一面；另一些词，可能一开始就只有或美或刺的一个方面，到后来，才具有了本义所没有的、与本义感情色彩相反的另一面。所以，只是笼统地说某词原来是某种色彩现在又变成了某种色彩，就显得不够全面。高名凯认为“词在演变的过程中，既可以增加新义，也可以丢失旧义”（《语言学概论》第135页），这是一种周赅的论断。

让我们看看钱钟书对一些语言事实的注意。

①风鬟雨鬓 《太平广记》(第四册第144页)《柳毅》一文,记柳毅与洞庭龙君交谈,“毅曰:‘见大王爱女,牧羊于野,风鬟雨鬓,所不忍视’”。下文钱塘君又歌曰:“腹心辛苦兮,泾水之隅;风霜满鬓兮,雨雪罗襦。”这两处都用了“风鬟雨鬓”这个形容词。结合《柳毅》前文写龙女牧羊于野,“然娥脸不舒,巾袖无光,凝听翔立,若有所伺”来看,这两处的“风鬟雨鬓”都不是对龙女仪态的赞誉,而是描绘一种形容憔悴的情态。钱钟书说:“是‘风鬟雨鬓’乃言容颜减悴,略同常语之‘满面风霜’、‘一脸风尘之色’。后世却以‘风鬟雾鬓’形容仪态万方,如苏轼《洞庭春色赋》‘携佳人而往游,勒雾鬓与风鬟’”(《管锥编》第807页)

“风鬟雨鬓”,本指“容颜减悴”,是贬词;今指“仪态万方”,是褒词,而且是这个词的主要的意思,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偶尔用一用这个词的“容颜减悴”的本义,如《管锥编》(第807页)所引李清照《永遇乐》“如今憔悴,风鬟雾鬓,怕见夜间出去”一类“用其语而未失本意”的句子。

一个词由贬及褒发生了变化,但那个“贬”的本义还可以偶尔用一用,这是一种可以引起注意的词义色彩变迁的情况。

②异端 “异端”是一个贬义词,如儒家学派把杨、墨之学看成“非圣人之道”的异端,基督教内称不符合“正统”教义的思想和学说为异端。但是,“异端”又可以当作一个中性词来用,它是医学术语中“偏方”的意思。《管锥编》(第1149页)拈出了一个例子:

嵇含《寒食散赋》:“既正方之备陈,亦旁求于众术。”按卷七六挚虞《疾愈赋》:“会异端于妙门”。“旁求”与“异端”,今世所谓“偏方”也;“偏方”之称亦即对“正方”而言。观挚《赋》上文云:“讲和缓之余论,寻越人之遗方,考异同以求中,稽众术而简良”,